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8.06.025

文化身份与文化心理的对立统一： 闻一多从诗人到学者的嬗变^①

顾金春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闻一多基本上停止了诗歌创作,兴趣转向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诗人到学者的文化身份转变过程。这次文化身份转变具有特殊的意义,表面上看,诗人与学者的文化身份是对立的,但其内在文化心理却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存在统一性。换句话说,闻一多的文化心理是统一的,一以贯之的,改变的只是表达的方式和载体而已。反映在其学术研究中,无论是研究对象、研究的内在精神、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的语言表达方面,都与诗有着密切的联系,体现了诗人与学者两种文化身份的融合与统一。

关键词:闻一多;诗人;学者;文化身份;文化心理;对立统一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6-0179-06

闻一多一生中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身份转变,一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他基本上停止了诗歌创作,兴趣转向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诗人到学者的身份转变过程。二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逐渐热心于政治,经历了从学者到民主斗士的转变。重新探讨闻一多从诗人到学者文化身份的转变,不仅有助于了解其当时的文化心态和所处的历史情境,对于更深入理解闻一多文化心理与创作无疑也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20世纪20年代的闻一多是以诗人的身份为众人所熟知,其创作的诗集《红烛》和《死水》表现了诗人对黑暗旧中国的批判和对祖国的挚爱,洋溢着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引起了当时热血青年的普遍共鸣。闻一多从诗人到学者的文化身份转变大概始于1928年下半年,这时候他担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等职务,8月,人物传记《杜甫》发表于《新月》第1卷第6号,这是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尝试。11月在《新月》第2卷

第9号发表论文《庄子》。1930年4月又发表《杜少陵年谱会笺》(《文哲季刊》第1卷第1期),这些可视为他学术道路的起步。1930年9月闻一多被聘为国立青岛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学系主任之后,他集中精力全面展开了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梁实秋回忆当时情况,“一多在武汉时既已对杜诗下了一番功夫,到青岛以后便开始扩大研究的计划,他说要理解杜诗先要简要理解整个唐诗,要理解唐诗需先了然唐代诗人的生平。于是他开始草写唐代诗人列传。积稿不少,但未完成。他的主旨是想借对于作者群之生活状态去揣摩作品的涵意。”^①

1932年7月闻一多辞去青岛大学教职,8月应聘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此后,他不肯再担任系主任等行政事务,而是专心于学术和教学。冯友兰在《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一文中说:闻一多“到清华以后,先七八年,章定主意,专心致力研究工作。他的学问也就在这个时期,达到成熟阶段”^②。而熊佛西在《悼闻一多先生——诗人、学者、民主的鼓手》一文中对这

① 收稿日期:2018-04-14

作者简介:顾金春(1971-),男,江苏南通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

①梁实秋:《谈闻一多》,《梁实秋文集(第2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542页。

②冯友兰:《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文学杂志》1948年第5期。

样的记载：“当时(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朋友们都引以为异：为什么象你这种一位才情纵横奔放的诗人不写诗而来研究中国的死文学？……你莞尔笑曰：‘我已发现我在创作方面无天才。诗，只好留给那些有天才的人们去写。’”^①此时，闻一多已经能够平静地承认自己创作灵泉的枯竭，彻底告别了诗歌的创作。1940年在致昔日学生赵俪生的信中，他说：“早年本习绘画，十余年来此调久不弹，专攻考据，于故纸堆中寻生活，自料性灵已濒枯绝矣。”^②所以可以认为是从青岛大学到清华大学的几年之间，闻一多经历并完成了从诗人到学者的文化身份的转变。

闻一多文化身份的转变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③。从时代背景角度来看，新格律诗实践带来的挫折严重挫伤了其新诗创作的积极性。从环境因素来看，青岛大学期间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繁琐的行政管理工作，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他无暇顾及诗歌创作。从个人因素来看，诗情的衰退导致了他的兴趣逐渐发生了转移，最终使重心从诗歌创作转移到古代文学的研究上。

第一是时代因素，主要是新格律诗实践带来的挫折。闻一多倡导新格律诗，深入探索了诗歌语言的特殊性，抵制和纠正了新诗创作中泛滥的散漫风气，推进了新诗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其价值与意义自不需赘言。但是，新格律诗歌本身有没有缺陷？新格律诗的倡导是否完全解决了新诗建设过程中的问题？这些都要打上疑问号。新格律诗固然解决了新诗发展中存在的自由散漫等文风，但过于追求音节、词藻和外形等形式因素，又使其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淖。形式层面的强调，限制了诗歌情感的抒发与想象的腾飞，压抑了诗人的激情与精神领域的开掘，最终导致新格律诗遭受到严重的挫折。

在闻一多看来，诗歌创作必须要继承传统，而五四诗坛追求的目标是抛弃传统，强调革新，“我们这时代是一个事事以翻脸不认古人为标准的时代。这样我们便叫作适应时代精神”^④。所以他

所面临的尴尬处境是“音节和格律的问题，始终没有人好好的讨论过。我又想提起这用字的问题来，又怕还是一场自讨没趣。总之，这些话，深的人嫌它太浅，浅的人嫌它太深，叫人不晓得如何开口”^⑤。这种矛盾心态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其对新诗前途的心灰意冷，同时也是导致其放弃新诗创作的重要原因。

第二是环境因素，主要是繁重教学任务和繁琐行政工作的拖累。作为当时和闻一多交往最为密切的朋友，梁实秋也许最具有发言权。他在《谈闻一多》一文中说：“一多到了武汉，开始专攻中国文学，这是他一生中的一大转变。……这一转变，关系颇大。一多是在开始甩去文学家的那种自由欣赏自由创作的态度，而改取从事考据校订的那种严谨深入的学究精神。作为一个大学的中文系教授，也是非如此转变不可的，何况他本身就有在故纸堆里钻研的癖好。”这段话其实已经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闻一多身份转变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态度的改变，由“自由欣赏自由创作”转向“严谨深入的学究精神”；二是本身的性格，“有在故纸堆里钻研的癖好”。

首先，我们可以先来看看闻一多在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9月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的教学情况。

1931年国立青岛大学文哲类每周授课时数为114，科目为23个，文学院教师22人，教授14人^⑥。这和《山东大学校史1901-1966》中所介绍当时“教授每周一般授课9-12小时”出入不大^⑦。闻一多每学年要上三门课，每周7节课，分别为《中国文学史》每周3节，《唐诗选讲》每周2节，《英诗入门》每周2节^⑧，工作量较大。繁重的教学工作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限制了作家自由创作的时间，使得其疲于应付，难以有更多的闲暇来从事诗歌创作。所以他在1930年11月7日致饶孟侃信中就抱怨说：“故纸堆终竟是把那点灵火焖熄了。”但同时他又找到另外一种寄托，“关于

①熊佛西：《悼闻一多先生——诗人、学者、民主的鼓手》，《文艺复兴》1946年第1期。

②闻一多：《致赵俪生》，《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页。

③周建华，陈昶：《从书斋到广场——论闻一多西周联大时期之思想转变》，《江汉论坛》2017年第5期。

④闻一多：《现代英国诗人·序》，《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

⑤闻一多：《谈商籁体》，《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

⑥民国20年教育部编：《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43、44页。

⑦山东大学校史编写组：《山东大学校史1901-1966》，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

⑧国立青岛大学编：《国立青岛大学一览·民国二十年度》，1931年版，第19-23页。

乘輿和服饰,我正想整理一番”^①。1930年12月10日,因情感涟漪而焕发过短暂的诗情,创作了一首诗歌《奇迹》,闻一多的兴奋溢于言表。而这首诗并非一蹴而就,是“花了四天工夫,旷了两堂课,结果是一首玩意儿”^②。由此可见教学工作对于其诗歌创作产生的巨大的消极影响。

老舍有两封信很能说明问题,一封是1933年写给赵家璧的,信中这样说:“《离婚》不能快成,我于上课时间实在没工夫写。”^③另一封是1934年山东大学任教期间给赵景深的一封信,“以前所写的长篇,都是利用年假与暑假的工夫”“我想了好久,确是非休息一个暑假不可了。我一想,不休息则会累死……”“平日一面教书,一面写,只能写短文”。由于教学工作比较繁忙紧张,老舍甚至发出“我很希望不再教书”的无奈感慨^④。

还有一个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沈从文。早在上海公学期间,他就说:“近在此成天上课,连作画也找不出空闲,文章停顿了。”^⑤“今年是还拟好好的来写几个中篇的,但一教书,真像唾也难得空暇……”^⑥1931年8月他去国立青岛大学任教,与闻一多做了同事。1932年2月12日致胡适的信中,他说:“寄来一本新书,内容不好,去年就只写这样一本东西,我想或者是因为我作了事,人反而变懒惰了。”^⑦此处“作了事”应该就是指到青岛大学任教,任教的结果是创作少了。1933年7月沈从文辞去青岛山东大学教职,到北平帮助杨振声编写中小学教科书。他对北平和青岛生活作了一个比较,“并且每日工作,时间不多,欲作文章,尚有余暇,故较之在青岛尚好”^⑧,感觉编书的工作比教学要轻松得多。

其次,除了较为繁重的教学任务外,闻一多还肩负行政工作。自1930年9月21日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并开学,他就被聘为教授,担任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学系主任,行政管理方面占据了其大

量的精力与时间。教学与行政工作分散了他的精力,客观上导致了他创作激情的衰退。

第三是个人因素,主要是诗情的衰退与兴趣的转移。如梁实秋所言,闻一多本身具有“在故纸堆里钻研的癖好”,“他的性格是凡事喜欢专注,一旦热心政治,便全力以赴;一旦从事学术文学,便废寝忘食。他做事永远是热诚的。”^⑨所以一旦他开始了学术研究,兴趣就很快从诗歌创作转移到学术研究上。这种转移最清晰地表现在他日常通信的话题中,其间在致胡适的信中,他谈到自己正在阅读关于金文一类书籍,并请胡适指点关于古地理和占史的书籍。他的学生臧克家也回忆说:“这时候,他正在致力于唐诗,长方大本子一个又一个,每一个上,写得密密行行,看了叫人吃惊。关于杜甫的一大本,连他的朋友也特别划列成了目录,题名:《杜甫交游录》。”^⑩

学术研究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兴趣转移带来直接的影响就是诗人创作激情逐渐衰退。其实早在1926年,闻一多就对友人说过:“数月来仅得一首,且不佳。惟于中国文学史,则颇有述作,意者将来遂由创作者变为研究者乎?”^⑪由此可见其在学术研究抑或创作这两条道路选择上的困惑。此后,其诗歌创作激情日益消减,直到1930年12月10日,因情感涟漪而焕发过短暂的诗情,创作了一首诗《奇迹》。此时,闻一多的兴奋溢于言表,他马上写信告诉饶孟侃:“足二三年,未曾写出一个字来,今天算破了例……毕竟我是高兴、得意,因为我已证明了这点灵机荒废了许久没有运用,但还没有生锈。写完了这首,不用说,还想写。说不定第二个‘叫春’的时候快到了你们该为我庆贺。”^⑫可惜这样的激情更多来自于外来偶然事件的刺激,不能长久。昙花一现之后,诗人又重归于沉默,所谓“第二春”只能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即

①闻一多:《19301107致饶孟侃》,《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4页。

②闻一多:《19301210致朱湘、饶孟侃》,《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4页。

③老舍:《19330206致赵家璧》,《老舍书信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

④老舍:《19341219致赵景深》,《老舍书信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⑤沈从文:《19291019复王际真信》,《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⑥沈从文:《19300112复王际真信》,《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⑦沈从文:《19320212致胡适》,《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页。

⑧沈从文:《19330824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

⑨梁实秋:《再谈闻一多》,《梁实秋文集(第6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461页。

⑩臧克家:《臧克家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页。

⑪闻一多:《1926年冬致饶孟侃》,《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

⑫闻一多:《19301210致朱湘饶孟侃》,《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4页。

的梦想,所以这首诗也只能算是强弩之末的创作了。

二

学术研究采用的是科学的理性的思维方式,而文学创作则是一种感性的活动。因而在一般人的视野中,诗人浪漫洒脱,狂放不羁;而学者则是温文尔雅,严谨理性。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两者的文化身份往往呈现出对立的姿态。但是,闻一多从诗人向学者的文化身份转变,从内在文化心理方面来说,却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换句话说,闻一多的文化心理上是一以贯之的,改变的只是其表达的方式和载体而已。反映在其学术研究中,无论是研究对象、研究的内在精神、研究方法还是学术语言方面,都与诗有着密切的联系,体现了诗人与学者两种文化身份的融合与统一。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把他称之为“诗人文学史家”^①。

首先,从研究对象来看,闻一多的学术研究偏向于诗歌研究。

“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②由于本身是一个诗人,所以闻一多在开展学术研究时选择了以唐诗作为起点。1933年9月29日他在致饶孟侃的信中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研究计划:第一是《毛诗字典》,第二是《楚辞校议》,第三是《全唐诗校勘记》,第四是《全唐诗补编》,第五是《全唐诗人小传订补》,第六是《全唐诗人生卒年考》,第七是《杜诗新注》,第八是传记《杜甫》。这八项计划研究的对象是《诗经》《楚辞》与《唐诗》等,都是与诗歌相关的内容。唐诗是闻一多研究的重点,研究成果有《唐诗编》上中下共3卷。从个体诗人研究来看,从初唐四杰开始,到陈子昂、孟浩然、贾岛、杜甫、岑参等;从整体研究来看,既有唐诗论著、唐诗大系、全唐诗汇补、全唐诗续补、全唐诗辨正等,还包括全唐诗人小传、全唐诗补传等。这些唐诗研究角度新颖,史料扎实,方法严谨,为唐诗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除了唐诗研究外,闻一多还对《诗经》《楚辞》《汉乐府》等诗歌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分析独特,俱让人耳目一新。从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12卷《闻一多全集》来看,其中涉及学术

研究主要是从第3卷到第10卷共8卷,而涉及诗歌研究的占了6卷,可见诗歌研究约占其学术研究的75%。在这些诗歌研究领域,闻一多都作出了杰出贡献。

其次,从研究的内在精神上看,闻一多的学术研究延续了其诗歌创作中的文化批判反思精神。

闻一多之所以被称为爱国主义诗人,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诗歌表达了对祖国痴情的爱恋与歌颂,而且还表现了对祖国前途与命运的担忧与焦灼。他深受传统文化精神的熏陶,同时又目睹了西方工业文明的进步,两者对比之后使他对本民族文化产生深刻的危机感。反映在其诗歌创作中,如果说《忆菊》中“啊!四千年的化胄底名花呀! / 你有高超的历史,你有逸雅的风俗!”表现了对本土文化的自傲,那么到了《一个观念》中,诗人则说:“你降服了我!你绚曼的长虹——/五千多年的记忆,你不要动, / 如今我只问怎样抱得紧你……”虽然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降伏了”诗人,但诗人又对这种文化的前途发出“怎样抱得紧你”的疑问。《祈祷》中“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则以连续追问的方式,苦苦寻觅答案:如何弘扬民族文化以抵御外来侵略?由此表达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沉重反思。

在闻一多的学术研究中,无疑延续了这种反思和批判。闻一多在给臧克家的信中,谈到了他学术研究的目的,“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冤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蠢鱼,不晓得我是杀蠢的芸香。”“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③他还说:“我读中国书是要戳破他的疮疤,揭穿他的黑暗,而不是去捧他。”^④这里,闻一多明确表达了他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寻找中华民族文化的病症,揭露批判传统文化中的腐朽落后思想,激浊扬清,给中华文化开出药方,从而实现民族的自救。可见,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是闻一多学术研究的源泉动力,其学术研究反映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与担当。

再次,从研究方法来看,闻一多的学术研究偏重形象思维。

①潘吉英:《灵魂的探险——闻一多〈唐诗杂论〉的独创》,《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6期。

②朱自清:《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页。

③闻一多:《19431125致臧克家》,《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5-316页。

④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

诗歌创作需要创造形象,大胆想象;学术研究则一般注重分析与概括的抽象思维方式。但闻一多学术研究中偏重形象思维,阅读闻一多的学术论文,我们经常会看到“疑心”“拟想”“试探”“大概”“若”“或许”等字眼。他经常采用大胆的形象,来进行文本的解读,阐述他的思想观念。

如在《杜甫》一文中,他想象四岁的杜甫观看公孙大娘舞剑器,“当中一个雄壮的女子跳舞。四面围满了人山人海的看客。内中有一个四龄童子,许是骑在爸爸肩上,歪着小脖子,看那舞女的手脚和丈长的彩帛渐渐摇起花来了。看着,看着,他也不觉眉飞目舞,仿佛很能领略其间的妙绪。他是从巩县特地赶到郾城来看跳舞的。”再如《匡斋尺牍》一文分析《诗经采芣苢》,“现在请你再把诗读一遍,抓紧那节奏,然后合上眼睛,揣摩那是一个夏天,芣苢都结子了,是采芣苢的妇女,满山谷响着歌声。这边人群中有一个新嫁的少妇,正捻那希望的玊珠出神,羞涩忽然潮上她的靛辅,一个巧笑,急忙的把它揣在怀里了,然后她的手只是机械似的替她摘,替她往怀里装,她的喉咙只随着大家的歌声啾着歌声——一片不知名的欣慰,没遮拦的狂欢。不过,那边山坳里,你瞧,还有一佝偻的背影。她许是一个中年的确确的女性。她在寻找一粒真实的新生的种子,一个祯祥,她在给她的命运寻找救星,因为她急于要取得母的地位以稳固她的妻的地位。在那每一掇一捋之间,她用尽了全副的腕力和精诚,她的歌声也便在那掇捋两字上,用力的响应着两个顿挫,仿佛这样便可以帮她摘来一颗真正灵验的种子。……”作者在分析作品时,借助想象的方式,描绘妇女采集芣苢的情景,从而还原了诗歌产生的历史背景。再如《诗经的性欲观》一文中,“你可以想象到了夜深,露珠渐渐缀满了草地,草是初春的嫩芽,摸上去,满是清新的凉意。有的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岩下,有的选上了一个幽暗的树阴。一对对的都坐下了,躺下了,嘹亮的笑声变成了低微的絮语,絮语又渐渐消灭在寂默里,仿佛雪花消灭在海上。他们的灵魂也消灭了,这个的灵魂消灭在那个的灵魂里。停了半天,他才叹一声:‘适我愿兮!’‘与子皆臧’也许是她的回答。”闻一多通过丰富的想象,描绘出《野有蔓草》刻画的浪漫情境,为客观解读这首诗作了必要的铺垫。

最后,从语言表达的角度来看,闻一多的学术研究多诗性的语言。

作为先前的一个诗人,闻一多在其后的学术研究中也经常采用诗性的语言,来进行感悟性批评。在《杜甫》一文中,他写道:“大约在二十岁左右,诗人便开始了他的飘流的生活。三十五以前,是快意的游览(仍旧用他自己的比喻),便象羽翮初满的雏凤,乘着灵风,踏着彩云,往濛濛的长空飞去,他肋下只觉得一股轻松,到处有竹实,有醴泉,他的世界是清鲜,是自由,是无垠的希望,和薛雷的云雀一般,他是 An unbodyed joy whose race is just begun.”诗性的语言,为我们描绘出青年杜甫轻松浪漫的生活。

在《庄子》一文中,“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惆怅,圣睿的憧憬,无边无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羨,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庄子仿佛说:那‘无’处便是我们真正的故乡。他苦的是不能忘情于他的故乡。‘旧国旧都,望之怅然’,是人情之常。纵使故乡是在时间以前,空间以外的一个缥缈极了的‘无何有之乡’,谁能不追忆,不怅望?何况羁旅中的生活又是那般齷齪、偏仄、孤凄、烦闷?”诗意的话语形象解释了庄子内蕴深厚的情感。《诗经的性欲观》一文中他说:“可是因为误信了毛公那疯子,古今讲这篇诗的,便没有一个人讲对。魏源瞄得比较准一点,不料他的箭快飞到靶子面前,忽然拐了一个弯,仍然没有射着圈心。”诙谐的语言幽默地点出魏源解读《诗经·候人》时的偏颇。《龙凤》的开头更是随意,“前些时候接到一个新兴刊物负责人一封征稿的信,最使我发生兴味的是那刊物的新颖命名——‘龙凤’,虽则照那篇《缘起》看,聪明的主编自己似乎并未了解这两字中丰富而深邃的含义。无疑他是被这两个字的奇异的光艳所吸引,他迷惑于那蛇皮的夺目的色彩,却没理会蛇齿中埋伏着的毒素,他全然不知道在玩弄色彩时,自己是在与毒素同谋。”在随意交待文章写作缘起的同时,形象说明了“龙凤”选题虽然题目光鲜,但内涵深厚复杂,写作难度大。

综上所述,闻一多的学术研究与其诗人身份关系密切,体现了诗人与学者两种文化身份的统一。

三

这次文化身份的转变对于闻一多来说也是被动的,并非像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闻一多是因为不能容忍“远离现实中的人民、集体,不忍目睹当

下民生境况,诗歌只能算是诗人对现实闭上双眼的一种美妙方式;缺乏一个切实的良知,受引导的‘应付生活’的有能力的拯救行为作为支撑,在这个民不聊生的时代,诗歌也只能是一次虚幻的写作,修辞的勾当,语词的附会”^①。也不是为了反抗旧文化的一种主动性的选择。转变的当时,闻一多感到痛苦、烦躁乃至失望,在书信中他表达得很明确,如在1927年8月25日致饶孟侃的信中他就曾这样说:“转瞬而立之年,画则一败涂地,诗亦不成家数,静言思之,此生休矣。”1930年11月7日致饶孟侃的信中,他再次清晰无误地表明了自己的心态,“近来也颇感着技痒,只是不知道如何下笔,干着急。怕的是朋友们问起我的诗”。由此可见,闻一多对于自身诗人的文化身份最初还是比较珍惜的,而学者的文化身份只不过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不过令人庆幸的是在闻一多身上,诗人与学

者两种文化身份并未形成真正的对立,而是最终融合并统一在一起。唐诗学研究专家陈伯海把闻一多的《唐诗杂论》称作是“诗思融会”学术范型^②。其实,不仅仅是《唐诗杂论》,闻一多的学术研究都具有“诗思融会”的特征。“闻一多的文学史研究其实始终处于强烈的性灵和故纸堆的张力之中。为什么要建筑有机体,为什么对于上古的歌、上古的舞、那些原始冲动和那些广场狂欢始终抱以极大的兴趣,乃至为什么从性欲这个角度解读诗经,为什么其结论出现了这么多的新奇——这些源于闻一多被压抑的那部分性灵。”^③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正是由于内在灵火的奔突,在诗歌创作终止之后,他把诗人所具有的全部激情都投注到文学研究中,才创造出具有“诗样精粹”风格的《唐诗杂论》《诗经研究》等研究成果,并最终成为一名杰出的独特的古典文学研究大家。

On Unity of Opposites Between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Wen Yiduo's Transformation from a Poet to a Scholar

GU Jin-ch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d-to-late 1920s, Wen Yiduo basically stopped poetry creation, and his interest turned to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experiencing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cultural identity from a poet to a scholar. Such transformation wa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Outwardly,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a poet and a scholar is opposite, but its internally cultural psychology does not change fundamentally. In other words, Wen Yiduo's cultural psychology is unified and consistent. What have changed is only the ways and carriers of expression. This characteristics can be found in his academic researches. Whether it i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inner spirit of research, the research method or the language expression of his researches,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poetry, reflecting the integration and unification of two cultural identities, i.e. a poet and a scholar.

Key words: Wen Yiduo; poet; scholar;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psychology; unity of opposites

(责任校对 刘兰霞)

^①荣光启:《试论闻一多诗歌写作的终结》,《南宁高等师范学校专科学报》1999年第2期。

^②陈伯海:《唐诗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93页。

^③王鸿莉:《压出来的“新”——论闻一多在性灵与故纸堆之间的挣扎》,《云梦学刊》2007年第1期。